



深入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其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两创”方针，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必将对中华文化走向新辉煌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编者

□ 钱 逊

文化的二重性：理论出发点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作为一个事物，它总有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或个性；同时，它又有和其他事物相同的普遍性或共性。个性和共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个别和一般的问题，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

文化也是一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不同，因为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时代变化自然导致文化也有不同，这是文化的时代性、特殊性。但文化又有延续性，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中又有着贯穿古今的东西，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总之，文化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又有贯穿始终、延续不变的基因。变化之中有不变，不变的基因贯穿于不断变化的形式中，决定着整个发展的过程，并通过不断的变化而发展。只见变化不见变中的不变，是片面的；只见延续不变

而不变正是通过变而实现，也是片面的。对待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该是抛弃其带有时代特殊性的成分，继承、发扬其民族文化的普遍性的成分。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作这样的分析。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具体的形态和内容，不能不带有时代烙印。但作为民族的文化，它是我们先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贯穿于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是民族的根与魂，有着普遍性的品格。传统文化的这种二重性，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个别与一般：转化和发展的过程

从事物内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来看文化的发展，就可知道，凡具普遍性的因素往往就是可以和应该继承弘扬的精华，凡属只适应旧时代需要的时代性的因素往往是应予批判抛弃的糟粕。而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

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而表现；正是在特殊性的具体表现中，蕴涵着普遍性的精神和原则。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简单地挑拣、选择就可以做到。要对传统进行分析，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剥离出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析出其内容。对传统中普遍性内容的继承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还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它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这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质。通过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实现了传统文化中普遍性精华的转化，而传统通过这样的转化而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继承、批判、创新、发展相统一。继承中有批判，批判是为了正确地继承；有批判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继承、延续。

根与魂：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发展是变和不变统一的过程，变的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是它的根本特质、根本精神，它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这不变的根本特质和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与魂。毁坏了根，切断了血脉，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发展。只有牢牢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发展。这是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之根本所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固本培根，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文化作为民族生存发展的根与魂，这种

价值与民族的生命同在。

从变的角度讲，传统文化的许多个别的具体内容，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了，其中一些在今天看来则有可借鉴的意义。但我们不可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只限于借鉴。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传承延续传统文化，就要把握传统文化中这一以贯之的根本，把我们一切工作，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把传统文化的根渗透到一切方面。只就个别的具体问题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借鉴传统文化用于当今的具体事务，而不涉及这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结果所得只能是一堆零碎的知识 and 结论，看似丰富多彩，却不见传统文化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脱离了根本，断掉了血脉，这些个别的具体结论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游离而无所依存的碎片，只能成为某种点缀或附庸。

精华与糟粕

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这是人们常常提出，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提出区分精华和糟粕，意义在于指出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简单继承、全盘照搬，也不能简单批判、全盘否定，而应有所分析，从而明确了对待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根本态度。这无疑是正确的。

提出文化的二重性，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文化的二重性是客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不是随意的。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哪些属于普遍性的因素，哪些属于时代性的因素，都是依据客观条件决定的，不依人们认识和好恶而转移。这就给区分精华和糟粕提供了客观的标准，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基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人们常把精华和糟粕看成不联结的两个部分，以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在精华和糟粕之间作选择。常有人问，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是精华多还是糟粕多？事实上，对传统文化是不可能作如此简单的分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结，不可分割。普遍性的内容总是与时代性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时代性的形态之中，通过其时代性的具体内容而表现；正是在特殊性的具体表现中，蕴涵着普遍性的精神和原则。比如，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原则总是与不同人对义的不同理解相联系。所以，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传统文化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两个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简单地挑拣分类，而是如前所说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只有经过这样的转化过程，才能既坚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使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要求，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高度。毛泽东在解释这一点的时候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是一个消化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挑拣选择所能解决的。

典型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有杰出的成果，作出了榜样。毛泽东的“老三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生和修养的思想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对于党

的思想和全社会的思想教育都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得到了发展。《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解释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是轻于鸿毛”。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同时，给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精神，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文中又提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说明既是对中华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的中国化的表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创造性的解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用中国传统的修养学说，提出和说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问题。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关于修身的意义和修养方法的基本思想，而它对共产党员修养的要求，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既对传统修养学说作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发展了传统修养学说，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老一辈革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典范。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继承这些经验，努力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作贡献。

干部国学苑

关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思考

——重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有感

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在理论上把错误思潮切实驳倒，并把理论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

□ 谢炯桐

近日，重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一书，很受启发，很受教益。对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问题体会尤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他还强调：“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等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特别是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同志发出的号召和政治要求。

对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要引起高度重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主动斗争和被动应战，效果大不一样。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对于斗争的胜利尤为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贯穿于迄今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部历史，或者说，一部国际共运史，既是一部政治斗争的历史，也是理论斗争和舆论斗争的历史。在不畏困难、主动斗争、坚决斗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开展的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是一例。民族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伦敦会议上，马克思提议把工人阶级对波兰起义的态度问题列入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蒲鲁东主义者却把民族说成是“陈腐的成见”，认为民族解放问题是一种倒退，讨论波兰问题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当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还拥有不少信徒，对此，马克思是清楚的，但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立场是坚决的，没有丝毫

的犹豫。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把反对沙俄、恢复波兰民族独立的问题列入了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态度上如此坚定，究其根本，是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危害认识与高度重视，马克思曾尖锐指出：“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迷惑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

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要在理论上把错误思潮切实驳倒。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错误思潮的本质，这是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关键所在。错误理论和思潮往往善于伪装，貌似科学，貌似有理，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上，保持强大定力和冷静头脑，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才有可能揭露和驳倒它们。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以《反杜林论》的诞生为例。当时为了揭露杜林的机会主义本质，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全面地反驳了杜林在各个领域的谬误，恩格斯曾说，在写《反杜林论》时，由于“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得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的创作过程形象地比喻为“跟着他到处跑”，可见写作过程之艰辛，驳倒杜林之不易。实际上，杜林也的确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不是一个一戳即倒的“稻草人”，他当过律师，后任柏林大学讲师。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他就曾撰文攻击。19世纪70

年代，他又写了《哲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等著作，狂妄吹嘘自己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与马克思以前的论敌不同，过去的论敌主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杜林却打着“革新科学”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发动全面的理论进攻。杜林不是一个普通的对手，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击败的。他是一个要从理论上击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比自负的人。正因为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威胁，李卜克内西才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出面批判杜林。当时，恩格斯正在忙于写作《自然辩证法》，但是面对敌人的挑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用了2年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杜林，后来集印成书，就是著名的《反杜林论》。

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理论队伍建设是基础。重读国际共运史，又增加一个突出的印象：一部波澜壮阔的国际共运史，一幕幕鲜活的历史活剧，一场场你来我往的理论交锋，都是由一个个正面和反面人物演绎的。正面的理论人物，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灿若群星。反面理论人物当然也不少，否则历史就要重写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论人才的特殊重要性。我们需要的理论人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能辨别理论是非、揭露错误思潮、引导和鼓舞广大群众。战场上，战士的武器是枪炮。意识形态斗争是另一种战场，理论人才就是战士，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从中国革命历史来看，两个战场从来都是彼此关联的。如抗日战争后期，面对日本即将投降的形势，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文，我们党很快就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这是一个理论斗争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例证。在解放战争

中，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发展，配合解放战争进程，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文章和谈话，这些舆论和理论工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密切配合，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进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今天，面对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面对国内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现实，党的理论人才培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理论人才培养重视不够的问题，这种局面迫切需要改变。广大理论工作者应切实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高从严要求自己。自己不能轻视理论工作，觉得“己不如人”，也不能把从事理论工作仅仅当成一种普通的职业，没有神圣感的工作是失血和苍白的。要看到理论工作的特殊性，要认识到我们今天从事的理论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捍卫，是对我们事业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捍卫，要看到我们的工作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要力戒浮躁，不怕苦不怕累，博览群书，勤于钻研，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能熟练运用之。要能针对错误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其谬误所在，彻底揭露其错误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要有真学问、真本事。有了一大批这样的理论人才，我们就不会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失语“挨骂”，就不会被一些错误思潮搅得束手无策，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的使命就会更好地完成，我们整个民族前进的步伐就会更加矫健、有力。

重读经典

法者，治之端也。

【讲话原文】

“法者，治之端也。”在日内瓦，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就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义，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出处】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意思是法度是治国的前提，而君子是法度的本原。一旦得到了君子，法律虽然简单，也能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没有君子，法律再完备，也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荀子认为“人治”和“法治”均为治国方略，但两者并非等量齐观。他提出“法者，治之端也”的命题，是把法看成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与“人治”相比，“法治”仅具有工具性特征以及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需要通过积极能动的“人”加以弥补。因此他主张：

——（战国末）荀况《荀子·君道》

【解读】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